

古代长城的诗歌意象

□ 赵 威

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，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历史进程，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意蕴。诗言志，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。作为传承长城文化的重要载体，古代关于长城主题的诗歌，记录了长城内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步伐，书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、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，同时也蕴含着守望和平的时代精神。

饮马长城：反对战争、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

长城作为诗歌意象，可以追溯到秦朝民歌《长城谣》：“生男慎勿举，生女哺用脯。不见长城下，尸骸相支柱。”秦始皇派蒙恬修筑长城，凡万余里，民怨劳苦，这首《长城谣》用直白的语言控诉战争，暗含了对和平的渴望。它也直接催生了汉乐府歌行体名篇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，这一古题被后代诗人传承下来，宋人郭茂倩编《乐府诗集》，收录同题诗达17首之多。《饮马长城窟行》全诗采用对话形式，前半段写役卒和长城吏之间的对话，“男儿宁当格斗死，何能怫郁筑长城”是他们的抱怨，也是发自心底的呼声；后半段是役卒和妻子之间的书信对话，引用了《长城谣》，表达了夫妻间“结发行事君，慊慊心意关”的一往情深，催人泪下。

此后，历代诗人将建功立业、怀家思归、同情民生、渴望和平等更为丰富的情感融入其中，从而使《饮马长城窟行》成为经典的乐府古题。这些诗词也激起了人们的共鸣，是对战争的无尽控诉和对和平的无限渴望。

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，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，以战止战、以防消弭战争是重要军事思想，修筑长城并不是害怕战争，而是要化解战争，增加游牧民族发动战争的成本，从而守护和平。因为游牧经济具有天然的非自足性，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，贸

易和掠夺是主要手段。当战争被长城这一防御系统抑制，游牧铁骑不能越过长城，长城两边就会通过朝贡、和亲、贸易等和平方式进行经济互补。

战争走了，来的就是和平。比如，长城线上的著名雄关雁门关，地处南北通衢、东西要路，是商旅贸易和民族交融的重要通道，有“早码头”之称。明代边将方逢时《塞上谣》对此有生动描写：“雁门东来接居庸，羊肠鸟道连崇庸。关头日出光瞳眈，于今喜见车书同。商旅夜行无春冬，南金大贝挈相逢，越罗楚练纷蒙茸。车频脂，马频秣，朝关南，暮关北。胡姬两两颜如花，入市时能歌贾客。”这首诗很好理解，描写了雁门关长城一带民族和好、商旅往来、人民安乐的太平景象。伴随战争、互市、通婚的，是一次次民族大融合。各民族之间的碰撞交流，在各自的经济生活、社会制度、风俗习惯、语言文字等方面发生变化，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，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。

身作长城：荡气回肠的爱国主义英雄气概

长城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，也就是中原王朝叙事中的边塞。边塞诗在唐代发展到极盛，长城主题的诗歌也极为丰富。

唐代的疆域极其辽阔，已经越过了长城一线，诗人笔下的长城也不再是具体的建筑，而是一种文学意象，将战场的悲壮、大漠的壮观、国家的强盛等与长城雄关联系起来，获得了历史的纵深、艺术的升华。其中，诗人强烈的反战情绪与舍身报国的家国情怀交织在一起，使得“当须徇忠义，身死报国恩”“昔日长城战，咸言意气高”等忠义精神与爱国情怀充盈其间，把个人英雄气概与牺牲精神比作长城，赋予长城内在的精神气韵。

王维《燕支行》的“誓辞甲第金

门里，身作长城玉塞中”、杜牧《咏歌圣德，远怀天宝，因题关亭长句四韵》的“广德者强朝万国，用贤无敌是长城”，更是强调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、国之栋梁就是国家的根基，就是维护国富民强的基本力量。这种比拟，影响至为深远，尤其是近代以来每遇外敌入侵，长城就成为全民族团结御敌的精神象征，鼓舞着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抗击侵略。

修筑长城的目的本身就是止战，是和平。到了宋代，内忧外患，风雨飘摇的南宋江山更是引起爱国诗人无尽的忧思。韩翃《寄哥舒仆射》中的“万里长城家，一生唯报国”、徐九皋《送部四镇人往单于别知故》中的“马饮长城水，军占太白星。国恩行可报，何必守经营”等诗句，都借长城抒发着尽忠报国的爱国精神和强烈的家国情怀。

爱国主义：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

宋代最著名的爱国诗人是陆游。他一生写了一万余首诗词，抒发了气壮山河的报国之情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长城是抵抗胡人南下的最为有力的军事设施，自然也就成了陆游用来鼓舞抗金斗志和抒发爱国激情的常用意象。

陆游曾亲临抗金前线，37岁那年，他在镇江府任通判。时右丞相张浚都督江淮各路军马，往来于建康、镇江之间，但不久兵败，收复故土的希望化为泡影，对陆游的打击尤大。后来他几次亲临宋金对峙的大散关前线，研究抗战策略。到晚年，念念不忘收复失地的陆游，62岁时又挥动凌云健笔，作《书愤》一诗：“早岁那知世事艰，中原北望气如山。楼船夜雪瓜洲渡，铁马秋风大散关。塞上长城空自许，镜中衰鬓已先斑。出师一表真名世，千载谁堪伯仲间！”全诗扣住一个“愤”字，追述早年北望中原的

壮志雄心，怎奈世事多艰，主和派苟安江南，贻误战机，失去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他自诩为“塞上长城”，只是令人痛心的是，志未酬，鬓先衰。

陆游的诗词中，还有很多借长城上著名关城来抒写胸臆的诗，这些也是陆游的长城诗意象。如雁门关，最有名的一首是《夜游宫·记梦寄师伯浑》：“雪晓清笳乱起。梦游处、不知何地。铁骑无声望似水。想关河，雁门西，青海际。睡觉寒灯里。漏声断、月斜窗纸。自许封侯在万里。有谁知，鬓虽残，心未死。”这是一首记梦词，上阕写梦游，下阕写梦醒，梦境与现实的错位给人以强烈的艺术冲击，徒生无限感慨。

记梦诗词是陆游爱国情怀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，看似荒诞，实则悲凉。据清人赵翼统计，陆游的记梦诗词有99首。《楼上醉书》中也出现了长城关隘松亭关：“丈夫不虚生世间，本意灭虏收河山；岂知蹭蹬不称意，八年梁益凋朱颜。三更抚枕忽大叫，梦中夺得松亭关。”睡梦中听到收复沦陷已久的松亭关的消息，高兴地大叫起来，诗人收复河山的心愿是多么迫切强烈。爱国主义像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，是古代文学的优秀传统，陆游长城诗歌是诸多爱国诗作中的美丽浪花。

长城诗歌承载着中国人独特的情感世界和精神追求，代表了中华民族向往和平的精神，这些诗篇总是能激发人们的爱国精神。“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”，每当强敌入侵，我们会爆发出强烈的保家卫国、抗争到底的爱国情怀和敢于亮剑、勇于献身的斗争精神。这也是鼓舞当代国人继续发愤图强的动力源泉。如今，我们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，就是要把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传承下去，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：“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”，涵养文化自信，振奋民族精神，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。

神灵，龙兴缔构，统十三甲而立国仁无敌，则曰征陈七大恨，以告天，师出有名”。

《皇清开国方略》在极力淡化与明朝的臣属关系，却始终在强调“满洲”自始就是生自中国大地上的一员，“兴王之始，长白朱果”，而非外来民族。虽然《皇清开国方略》给“满洲”的起源赋予了天命神话色彩，然而，就连这种书写方式也是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惯例，这也是为何在阐述满洲起源时，该书始终在寻找与之相似的“同类”事迹。国史馆史官在撰写《发祥世纪》时就较为明确地指出，“犹《商颂》之陈玄鸟，《周雅》之咏公刘”。《皇清开国方略》比较自觉地运用古代中国故事进行比较，实际上也是在潜意识里表达出清朝将自己视为历代王朝的延续。就《皇清开国方略》中论述满洲生活的地域来看，也始终发源于中国大地，“我朝始基居长白山北之俄朵里城”，其中蕴含的潜台词就是，“满洲”为中国多民族的一员，那么，入主中国的资格就不容置疑。《皇清开国方略》的编纂也发出了乾隆帝内心深处的真实话语，“盖溯自三代以来独得大一统之正”。

综上，《皇清开国方略》一书的编纂无论是宣扬帝王“武功”，还是“法祖图治”，乃至诠释正统，均为清朝在构建历史记忆与强化国家认同上的努力。这也深刻展现出清朝战争观的核心要义在于维护国家统一，而战争史的编纂则服务于国家治理。



铸就建筑史上无钉传奇

□ 王 雪

榫卯工艺，是一种利用木质构件间的凹凸结合构造，通过榫头与卯眼的精准咬合，实现木料间牢固且灵活连接的技术。榫卯结构无需钉子或胶水，凭借木质本身的力量和形体设计，创造出既稳定又具有弹性的框架体系，在建筑、家具等领域展现出卓越的承载力与艺术魅力。它是中华民族以智慧凝结而成的木质构件间天衣无缝的对话，是工匠精神与科学实践的高度融合。

榫卯这一蕴含着中华民族卓越智慧与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建筑技艺，起源于远古时期，历经数千年的演变与发展，成为中国古代木构建筑艺术的核心技术。

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遗址中，榫卯结构的雏形便已在华夏大地上显现。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发现的河姆渡遗址中，考古学家发掘出大量保存完好的榫卯结构木质建筑构件。这些构件的出现揭示了约7000年前，华夏祖先就已经掌握了将木料通过凹凸拼接的方式进行连接的技术，从而实现了建筑结构稳固组合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榫卯结构主要包括用于构建干栏式建筑的地基桩、梁柱以及地板间的连接部分，它们相互咬合，无需铁钉或绳索加固，展现了先民对于力学原理的深刻理解和精湛的手工艺。

进入商周时期，随着青铜器时代的到来以及奴隶制社会的兴盛，大型宫殿、宗庙和陵墓的建设需求愈发强烈，榫卯结构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。尤其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兴建大规模工程，如长城和阿房宫等，无疑是对榫卯技术的重大考验，同时也是对其精进的重要推动力。至汉代，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和铁器的广泛使用，极大地促进了木工工具的改进，使得榫卯加工更为精细准确。同时，汉代建筑在空间布局和装饰风格上追求宏大气象，榫卯结构在此背景下逐渐细分出多种形态，如燕尾榫、银锭榫、直榫、斜榫等，不仅用于木构架，还被创新性地应用于砖石建筑中，如榫卯砖的出现，体现了古代工匠在建材连接技术方面的高超智慧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中国经历了民族大融合，多元文化交流促使家具设计和制作工艺大幅提高，榫卯结构的应用领域拓展到家具制造，如束腰结构的引入和发展。唐宋时期，木构建筑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，榫卯结构更加繁复精密，广泛应用于殿堂楼阁、佛塔廊庑等各类建筑之中，唐代遗存至今的山西省五台县南禅寺、佛光寺等建筑即是榫卯技艺巧夺天工的例证。

明清两代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发展的鼎盛时期，榫卯技艺也随之达到极致，形成了完备的体系。王世襄在其著作《明式家具研究》中写道：“我国家家具结构，至宋代而愈趋成熟。自宋历明，又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发展，各部位的有机组合简单明确、合乎力学原理，又十分重视实用与美观。这个‘结构’，便是指榫卯结构。”明清家具以其独特的榫卯结构著称于世，无论是官帽椅的搭脑榫、圈椅的夹头榫，还是柜子的棕角榫，均展示了工匠们对于力学原理与美学标准的完美结合。

榫卯结构广泛应用于中国古代建筑，包括宫殿、庙宇、塔楼和园林，如故宫、天坛祈年殿、应县木塔、悬空寺等，以及古代木质家具、建筑模型和木质建筑构件等文物中。故宫作为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杰出代表，其建筑设计与施工技艺均达到了极高的水平，对榫卯结构的应用更是发挥到了极致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精细化设计。每一处榫卯的形状、尺寸和位置都经过精确计算和设计，确保不同部件间的紧密结合，既能承受垂直荷载，又能有效抵抗风力、地震等水平方向的有效、多样性与复杂性。故宫建筑中的榫卯结构种类繁多，如直榫、斜榫、透榫、半榫、燕尾榫等，尤其是角楼等复杂结构中，采用了层层叠叠、错综复杂的榫卯连接，充分展示了古代工匠的卓越智慧和精湛技艺。力学原理运用。榫卯结构遵循了自然的力学规律，通过不同榫卯间的咬合和制约关系，既保证了结构整体的稳定性和抗震性，又允许木材随温度和湿度变化而自然收缩膨胀，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应力破坏。美学价值。故宫建筑内部外部大量运用榫卯结构，同时也注重其视觉效果和装饰性，许多榫卯连接处还巧妙地融入了雕刻装饰，使得结构本身也成为艺术品的一部分。

此外，故宫中的大量家具也充分运用了榫卯结构。故宫内的椅子，无论是皇室成员使用的还是日常家具，均体现了这一精湛技艺。这些榫卯结构隐藏在建筑和家具的华丽装饰之下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内涵，

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工匠精神和卓越技艺的生动体现。

在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瑰宝中，榫卯结构犹如一首凝固的诗篇，流淌着祖先们的才情，更展现出中华民族的智慧。

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。榫卯结构秉持着中华民族“天人合一”的宇宙观。人们将大自然的律动与生命的韵律交织在每一道结合之中。他们借由木材天然的纹理与形态，运用榫卯契合的方式，无需借助金属器具或化学黏合剂，便能构建起稳固耐用的建筑框架。这种工艺充分尊重并顺应自然，寓含着生态智慧，彰显着古人与天地共处、物我交融的大道哲学。每一座凭借榫卯技艺矗立千年的古建筑和文物，都是对和谐共生理念的生动实践和见证。

力学美学的科学智慧。榫卯的微妙之处在于其独特的力学原理与几何美感的完美结合。每一个榫头与卯眼的尺寸、形状与角度，都经过精心计算与打磨，使得部件之间既能紧密结合，又能灵活适应温度、湿度的变化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。这种力学上的巧思与严谨，展现了兼备实用与审美的科学智慧。

时空对话的传承智慧。榫卯不仅是物质实体的巧妙结合，更是历史与未来、传统与现代的交响乐章。它的存在，是一代代工匠精神薪火相传的象征，它承载起的是厚重的历史记忆与民族自豪感。面对现代工业化进程的冲击，榫卯工艺仍然以其独特的韵味和持久的生命力赢得了世界的瞩目。它促使我们反思科技进步的同时，要保持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珍视，鼓励我们在继承与发扬中找到属于新时代的榫卯语言，让这份凝聚了华夏先祖智慧的工艺在时光流转中熠熠生辉，永续流传。

榫卯这一独特的建筑技艺，以其生态智慧、科学智慧和传承智慧，构筑起了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一部分，成为连接古今、沟通中外的重要桥梁。在国际传播过程中，榫卯更是以其独特的力学原理、精巧的设计及蕴含的东方智慧吸引了全球关注。它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与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启发并影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建筑学、设计学乃至哲学领域的思考与发展。通过研究和借鉴榫卯技术，各国能因此增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，同时也促进了技术创新和多元文化的交融，从而在人类文明的共享与互动中发挥积极的纽带作用。榫卯不仅是一项传统工艺，更是关于人类与自然、科技与人文、过去与未来对话的中国智慧。



《皇清开国方略》：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

□ 李金飞

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“大一统”的封建王朝。清前中期出现了“康乾盛世”，“大一统”的辽阔国土也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版图，这些突出的历史贡献与清朝所进行的诸多国家统一战争密不可分。盛清时期，由乾隆帝亲自主导编纂的《皇清开国方略》专门系统记载了清初入主北京之前的开国战争历程，成为“大一统”国家形成与巩固的见证，被寄予了“法祖图治”、诠释“正统”等理念，从而成为构建历史记忆与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文本。

主要内容与宣扬“武功”。作为一部用来重构国家历史记忆的史书，《皇清开国方略》在众多方略中较为特殊。按照惯例，新修方略均是由常设的方略馆负责，更何况，乾隆朝的方略馆建制已经较为完善，更是由军机处直接统辖，在众多史馆中地位极高。方略之外，方略馆还兼修了诸如《钦定皇舆西域图志》《大清一统志》《满洲源流考》等史志典籍。然而，《皇清开国方略》的编纂却并未选择方略馆，而是由国史馆兼修，“谕国史馆恭辑《开国方略》，著大学士公阿桂同办”。乾隆帝这样安排恐怕也是另有政治考量，那就是不仅把该书视为战争专史，更是有意拔高成国家通史。

《皇清开国方略》自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开馆编纂，至乾隆五十一年结束，共成书32卷，主要记载自努尔哈赤起兵至顺治定鼎北京以约前60余年时间里的战争史实，即“自俄朵里以至赫图阿拉，因十三甲，肇路蓝缕，得盛京而定王业”的完整历程。另外，特撰写《发祥世纪》一卷置于文本之首，是为叙述“满洲”一族的发源。该书采用了满、蒙、汉三体进行“编年纪月”，遵循方略体叙事本来的叙事方式，把“大一统”清朝的前身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展现。

《皇清开国方略》为确立文本的严肃性与权威性，在史料征集上尤其注

重从官方史书中探寻，特别是确立了以“实录”为核心的资料来源。根据《御制开国方略联句》的记载：“编纂《方略》，皆本于《开国实录》。”该“实录”是清朝首部实录，于天聪六年（1632年）至崇德元年（1636年）撰写，“文直事核，足资垂信”。而关于皇太极和顺治两朝的事迹，《皇清开国方略》也主要从《清太宗实录》和《清世祖实录》中搜罗整理。国史馆在处理《皇清开国方略》文本内容与已修“实录”关系上遵循着“据事直书”的原则，并不做主观的辞藻修改与修饰。

“法祖图治”与教育臣子。清朝史书中涉及开国事迹的内容大都记于帝王实录与圣训中，而这种分散性的记载显然并不能满足教育的目标。更为重要的则是，该类史书深藏宫廷，几乎并不能够为外人所见。因此，乾隆帝针对《皇清开国方略》的编纂明确强调，该书一定要实现广泛的传播，让朝臣、地方官员、八旗子弟等多群体阅读，务必深刻体会和领悟“创业之艰难，贻谋之远大”的精神，从而也在事实上让《皇清开国方略》扮演了官方“教科书”的角色。

可以说，乾隆帝之所以亲自倡导编纂《皇清开国方略》，一个直接动因就是通过对祖宗创业事迹的真实描述来达到“教育”臣子的目的，“恭读太祖、太宗实录，见开国之始，躬冒矢石，栉风沐雨，深思永念，因命恭辑《开国方略》”。尽管乾隆帝认为阅读祖宗的艰难创业事迹，“有不忍观、不忍言而落泪者”，然而，却也指出，恰恰是这些感人肺腑的真实画面才能够触动人心。似乎正是出于这种政治文化考量，乾隆帝才较为明确地指出，开国事迹与“定中原”相比较而言，更适合作为教育的文本素材。

乾隆帝指出，编纂此书是为了教育臣子，让臣子在接受开国国史的教育中，实现奋发有为，维护来之不易的

“大一统”功业。乾隆五十年（1711年），乾隆帝在阅读《皇清开国方略》时就依据“昔太宗文皇帝时，恐我满洲骑射、清语日久生疏，曾经特降谕旨”的历史故事来敦促臣子“务令各勤旧业”。当然，乾隆帝也强调，该书所拥有的教育价值绝非仅限于一时和一人，而是应当作为“范本”世代流传，被爱新觉罗家族所共读，“非啻自励而已也。欲我万世子孙，皆如予之。”因此，他颇有感慨且较为严厉地强调：“观此书之志，其弗动心落泪，深思永念，以敬天命守祖基兢兢业业。惧循环治乱之几，则亦非予之子孙而已矣。”这恐怕也是对于盛世之后国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的担忧，因此，警示后世子孙“知创业守成之并重”。

诠释清朝的“正统”。《皇清开国方略》的编纂还与这一时期清朝所努力构建的王朝“正统”密切相关。清朝成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后，其“夷狄”身份深刻影响着“正统”性的确立，特别是汉族士大夫始终倡导的“华夷之辨”论调让清统治者倍感压力。而通过国家修史进行文本建构成为诠释国家“正统”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，在乾隆朝实现引以为傲的“大一统”后，也就更有底气来诠释清朝的“正统”。《皇清开国方略》中包含着诸多关于建构“正统”的话语，特别是在论证清朝的“得大一统之正”上着笔，以此从根源上证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。

《皇清开国方略》在界定东北时期的后金一清与当时的中央政权明朝关系之时，有意在突出强调“虽曾受明之官号”，但“非如亭长、寺僧之本其臣子也”，称“究不过羁縻名系而已”，这显然是为了否定曾是明朝“属国”的事实。这些带有显著篡改历史、史实嫌疑的文本话语，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思考，那就是为证明清朝起兵并非臣子对君主的战争，并不具有“犯上作乱”性质，“太祖高皇帝天宣